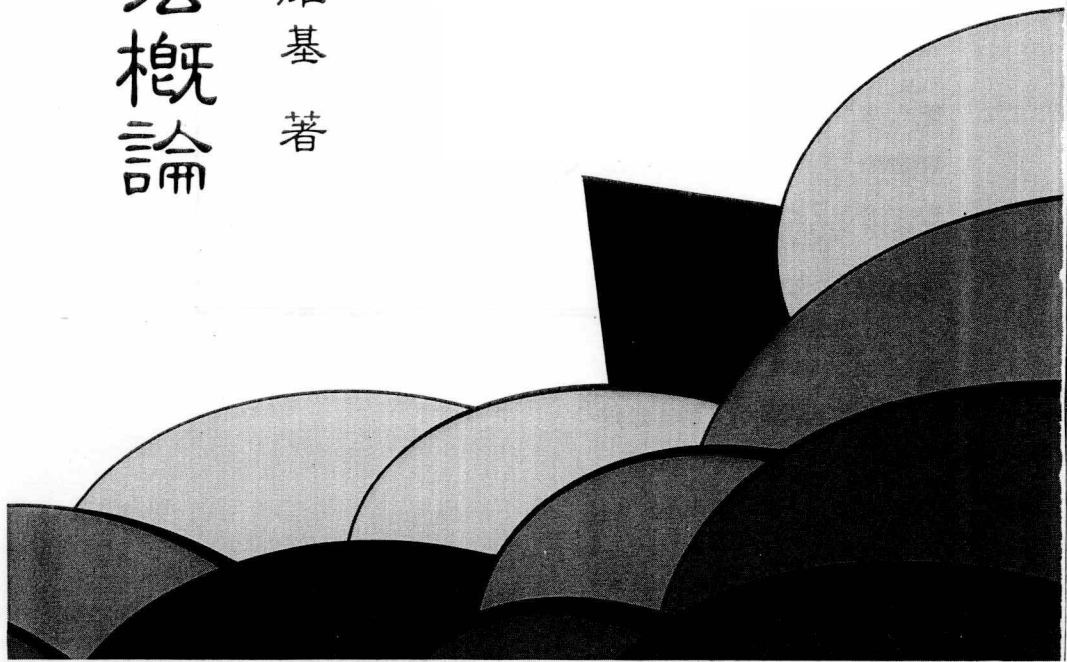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謝耀基，喇沙書院畢業，香港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並取得香港大學教育文憑。現任賽馬會體藝中學中文科科主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學助理、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

現代漢語 歐化語法 概論

謝耀基 著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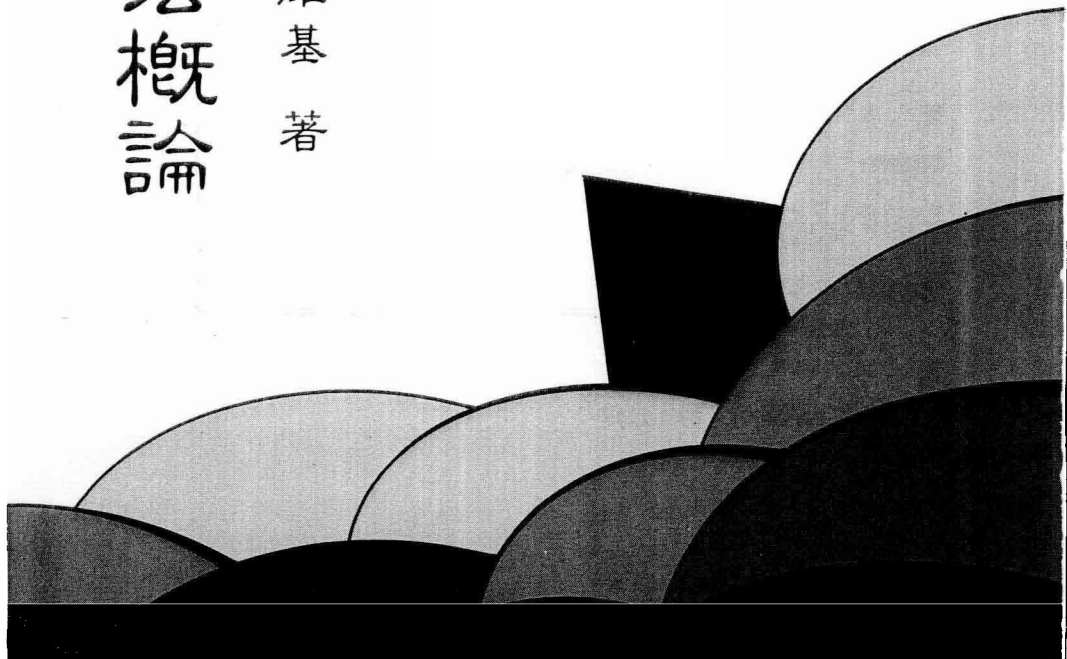
*This book was recei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ook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Section 4*

作者簡介

謝耀基，喇沙書院畢業，香港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並取得香港大學教育文憑。現任賽馬會體藝中學中文科科主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學助理、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

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

謝耀基 著



自序

多年前在大學修讀現代漢語，對外語影響漢語的問題已感興趣。畢業後在中學任教，看見很多學生寫用中文時，往往都夾雜用上一些外語譯詞、詞法和句式，寫出許多所謂“西式中文”的文字來。這便更使我相信，對這個日益普遍的語法現象，實在需要有進一步的探究和認識。

其實，現代漢語受歐西語言影響，已是七、八十年間的事了。在五四時代歐化洪潮的推動下，加上漢語內部發展的需求，漢語歐化真可如魯迅所說“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了。因此，從事語文學習、研究以及工作的，對這個“必要”的語法發展趨勢，理應有比較全面而明確的認識。寫作《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就是希望藉著探討這個專題，嘗試對語法歐化的成因、現象和影響作出較概括而完整的歸納、分析，從而就漢語規範化工作提出一點意見。

撰寫期間，香港大學中文系趙令揚教授和李家樹老師都給我鼓勵和意見。在這裡我謹衷心表示謝意。

謝耀基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 漢語論叢 •

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

著者：謝耀基

封面設計：何乃堯

印刷：三達製作公司
香港灣仔道139號富達樓10樓

出版發行：光明圖書公司
香港摩利臣山郵政信箱47219號

版次：1990年1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自序	I
導論	1
上編	現代漢語語法歐化的成因	6
	第一節 歐化的社會、社會的歐化	7
	第二節 新文學三部曲——介紹、模仿、創造	10
	第三節 翻譯——歐化的利器	14
	第四節 “模仿”的成品——歐化文學	20
	第五節 也是模仿——受羈絆的漢語語法學	26
	第六節 小結	32
中編	現代漢語語法的歐化現象	35
	第一節 詞	35
	(一)詞的結構	35
	1.內部形式(構成方式)	35
	2.外部形式(語音形式)	42
	(二)詞形變化	45
	1.內部形態	45
	2.外部形態	46
	(三)詞類發展	55
	1.數量詞	55
	2.代詞	58
	3.連詞	63
	4.助詞	67
	5.介詞	69

第二節	詞組	71
	(一)述賓結構	71
	(二)主謂結構	74
	(三)偏正結構	75
	1.正項	75
	2.偏項	76
	四述補結構	78
	(四)聯合結構	79
第三節	句子	80
	(一)句子成分	80
	1.主語的增加	80
	2.謂語的省略	83
	3.複雜的定語、狀語	84
	(二)句子組織	85
	1.偏句後置	86
	2.人稱代詞前置	88
	3.敘述對話時的語序變化	89
	4.關聯詞的多用	91
	5.新的插語法	92
	6.對話的省略	94
	(三)句子類型	95
	1.被動句	95
	2.是字句——判斷句、描寫句、敘述句	99
下編	漢語歐化語法規範化問題	104
第一節	歐化的善與惡	104
	(一)善性的歐化	104
	(二)惡性的歐化	111
	1.外來語詞	113
	2.詞綴	116

	3.助詞	117
	4.代詞	121
	5.連詞	123
	6.數量詞	124
	7.介詞	124
	8.長句	129
	9.被動句	132
	10.是字句	133
	(三)小結	135
第二節	對漢語歐化的態度和漢語規範化	137
第三節	漢語發展的路向	
	— 歐化語法規範化的標準和要求	150
附註		157
參考書目		191

導論

王力曾說：“文法的歐化，是語法史上一樁大事⁽¹⁾。”的確，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從文言到當時的舊白話，再從當時的舊白話規範到現在的新白話，短短數十餘年之間，文法的變遷，比之從漢至清，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漢語語法結構規律的變化和發展，就受了歐西語言很大的影響。陳望道把中國文法思想的進展，分爲“自發”、“模仿”和“締造”三期，大抵都以中國文法和西洋文法學術思想的接觸作爲界線⁽²⁾。而張志公也曾說過：“八十年來，我們的語法研究，不管那種體系，不管那一家，共同不足的地方就是始終沒有擺脫西方語法學的羈絆⁽³⁾。”由此可見歐化語法對漢語的影響力。誠如王力所說：“咱們對於這一個大轉紐，應該有一種很清楚的認識⁽⁴⁾。”所以，他的《漢語史稿》就曾專題談及五四以後因歐化而新興的句法，《中國現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理論》就更立單章論析歐化的語法問題。可是，正如他說：“關於這一方面，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工作還做得太少⁽⁵⁾。”雖然早在1943年，朱自清就已指出：

中國語的歐化或現代化已經二十六年，該有人清算一番，指出這條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寫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創造“文學的國語”⁽⁶⁾。

但是歐化語法的研究，自現代漢語語法學發展以來，還是做得不足夠的⁽⁷⁾。因此本書的目標，就在探討自五四以來歐化語法對現代漢語的影響，希望能透過實例來說明這個語法現象，通過中西語言的語法比較，找出漢語的特點，從中發現其語法規律，並盡量從語法學的角度來作出分析，以求達成一個比較全面而有系統的論析。

本書擬分三編分述有關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的問題。首先，在這裡先給“現代漢語”、“歐化”、“語法”下個定義，確立論述範圍。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語言。“現代漢語”就是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所謂“歐化”，是指受到“印歐語系”語言的影響。“印歐語系”中，中國人懂英語的比懂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語的多得多，加上英語跟漢語在語法結構方面相似之處很多⁽⁸⁾，英語對漢語的影響也最大；故此，所謂歐化，正如王力所說，大致就是英化⁽⁹⁾。至於“語法”，乃就語言結構來說。語言是以語音為物質外殼、以詞匯為建築材料、以語法為結構規律而構成的體系⁽¹⁰⁾。語言的結構大體可分為語法、詞匯和語音。而語法，就是詞的構成、變化規則和組詞成句規則的總和，也就是組詞造句的結構規則。在這個定義裡，語法包括詞法和句法兩部分，涉及詞素、詞、詞組和句子各個語言

單位。故此，《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就是以“現代漢語”為本位，以“歐化語法”作論述對象，探討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在語法方面受到印歐語法的影響。至於像洋涇濱英語⁽¹¹⁾、新式標點和分段橫寫等新格式⁽¹²⁾，以及從歐洲傳來的新文體如新詩、小說、話劇等⁽¹³⁾，卻就並非要論述的範疇了。

上編就會探源溯流，析論歐化語法的成因。當中，語言的內部發展和社會的外在刺激，都不容忽視。就語言因素來說，語言的“不平衡性”和“漸變性”兩個特性，就推使語言不斷作出適當的調整，淘汰舊的分子，添進新的成分；而且吸取外來養分，來滋養和充實自己。就社會因素來說，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自然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發展而發展。現代漢語的歐化，就可說是根植於五四時代的歐化洪流裡。其中如“全盤西化”的態度、觀念，中西語言的接觸、借貸，新時代新的交際需求，新文學工作者的理論和歐化作品，翻譯的直接影響，以至漢語語法學模仿並借用西洋語法理論等，本書都自當分節論述，剖析跟漢語歐化的關連。

中編就會從詞、詞組、句子三方面，析述漢語語法的歐化現象，並從中揭示中、西語法異同之處。五四以來，現代漢語受西洋影響而改變了部分的結構形式，在組詞造句方面添上一些新的成分和用法。就“詞”來說，音譯式造詞，利用新興詞綴構詞，複音詞的大量創造，以至時態助詞“著”、複

量助詞“們”、數量詞“一個”、“一種”、代詞“他”、“她”、“它”、連詞“和”、“或”、介詞“在”、“當”等的發展、多用，都是較明顯的歐化結果。其次，從“詞組”來說，如述賓結構中兩個或以上的動詞共帶一個賓語，偏正結構中人稱代詞充當正項和偏項的結構趨向複雜，述補結構中“使成式”的大量增加等，都不容忽視。至於從“句子”來說，主語的增加、謂語的省略、複雜的定語和狀語，都屬於句子成分的變化、發展。而句子組織，也出現偏句後置，敘述對話時的語序變化，以及多用關聯詞、使用新的插語法等。句型方面，被動句和是字句亦有了新的發展。在論述此等歐化成分時，當引列例子幫助解說⁽¹⁴⁾。

下編會論及歐化語法的規範化問題。漢語的歐化，給漢語補充了新的養分，對漢語造成很大的影響：它一方面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使現代漢語的語句結構嚴密複雜，使白話多些變化，另一方面更幫助新文體和新作風的創造。魯迅說：“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¹⁵⁾。”王力說：“語法歐化的趨勢是極自然的，正如生活的歐化一樣。一切反對的力量都遏不住這個潮流⁽¹⁶⁾。”現代漢語需要吸收歐化語法，已經是不容爭辯的了；但是，若濫用、誤用而弄致惡性歐化，就只會損害現代漢語的特性，妨礙漢語的發展。我們固然不應該也不可能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可是我們也不能讓盲目歐化的人牽著鼻子走。

呂叔湘說：

我們應該拿現代漢語的語法規律做基礎，適當地吸取外國語的語法規律，用來增加我們語言的嚴密性⁽¹⁷⁾。

我們既要重視外來影響，吸收一切有用的東西，又要注意不忽視漢語特點。因此，現代漢語如何吸收歐化語法，或者歐化語法如何規範化，也就成為本編析論的焦點了。

上編 現代漢語語法歐化的成因

王力曾說：

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路線，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第一個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第二個因素是漢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¹⁾。

語言學描述語言。它的發展，包括語言內在因素和社會外在因素。現代漢語的歐化，當然也不例外。就語言的因素來說，語言內部發展的“不平衡性”，容許並幫助打破各組成部分（語音、詞匯和語法）原有的關係，從而使各部分相應地發生變化，形成新的關係，達到新的適應。同時，爲了不斷擴大和改進本身的基本要素，語言的“漸變性”，又容許、推使新質要素逐漸積累，舊質要素逐漸衰亡。

但是，這些語言的內在發展因素是客觀存在的，現代漢語的歐化，還得配合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需求。胡裕樹在《現代漢語》裡就曾指出：

語言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發展而發展。它的發展速度和社會發展速度密切相關⁽²⁾。

下面就分節說明漢語歐化的種種因素。

第一節 歐化的社會、社會的歐化

語言是人類發音器官發出的語音同一定意義的結合體，用作傳遞訊息、進行交際的一種工具。既然是人類社會的產物，自然跟社會有極密切的聯繫。它可說是一種社會現象，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各種各樣的社會歷史現象，比如政治的變革、經濟的增長、文化的進步、教育的普及、宗教的傳播、科技的發展、社會結構與制度的變更、語言社團成員結構的變化以至不同語言社團之間的接觸和交往等，都直接影響語言的變化和發展。

社會的發展既是語言發展的動力和基礎，因此，要了解現代漢語和它發展的規律，就“只有密切聯繫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繫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³⁾”。

現代漢語的確立，可說是近七十年間事；它的歐化，也是近七十年來，隨著社會“歐化”而產生的必然現象和趨勢。

自鴉片戰爭以後，我國跟外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面的交往日益頻密，新事物、新概念不斷從西歐傳入，中國舊有的生活方式迭遭衝破、社會結構亦發生動搖；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如倫

常道德、學術思想甚至語言文字，也隨而改變。爲了抗拒列強侵凌，清末的知識分子已認識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要。例如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張之洞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康有爲、梁啓超力倡輸入西學，變法維新等。及至五四前後的幾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更急劇轉變，其中如科舉制度的廢除、滿清王朝的顛覆、中華民國的成立以及新聞、教育事業的發達，都造就了許多新人物與新思想冒出頭來；而歐美各種主義、理論如潮湧入，如胡適引介“易卜生主義”、採用杜威“自然主義經驗論”、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更使學術思想界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景象。再加上留學生紛紛學成歸國，都想改革積弊，開創風氣的先河。他們一方面目眩於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文化，一方面又體嗜了當時中國政治的腐敗、思想的愚闇、經濟建設的落後，並不曾因滿清傾覆而有所改善；袁世凱竊國稱帝、張勳復辟以及十年軍閥割據、混戰，更驅使他們陷於絕望的深淵。在感慨激昂之餘，便一轉而群起攻擊中西文化調和的思想⁽⁴⁾，提出社會“全盤西化”的主張。

“全盤西化”，無疑否定了中國本身優秀的傳統文化，固屬偏激，也可說是極度自卑和狂熱模仿的後果，但它不啻造成了相當的衝擊力，推使國人的思想、科技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甚至語言、文字，也從傳統中解放出來。胡適就曾指出：

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⁵⁾。

語言反映思想，直接聯繫思維，是思維的工具。隨著社會的歐化，新事物、新概念層出不窮，人類的思維也愈變得細緻複雜；這些都向交際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動語言結構不斷豐富詞匯、改進語法。同時，由於科技躍進，交通工具、傳播媒介日益發達，就大大縮減了時空的局限性，使中西社會的聯繫、交往，更見頻繁，縮小了地域上的語言差別，也加深了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薩丕爾（Edward Sapir）在《語言論》（Language）中說：

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交際的需要使說一種語言的人和說鄰近語言的或文化上佔優勢的語言的人發生直接或間接接觸。交際可以是友好的或敵對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務和交易關係的平面上進行，也可以是精神價值——藝術、科學、宗教——的借貸或交換⁽⁶⁾。

的確，爲了滿足日益擴大的交際新要求，活的語言會不斷充實和調整它的結構、規律，還會吸取別的語言成分來滋養自己，充實自己。語言社團之間各種形態的接觸，不論程度怎樣，性質怎樣，都足以

引起語言的交互影響，推進語言的發展。

總之，社會生活發生變化，語言文字亦毫不含糊地隨著它進展的步伐而發生變化。胡適說：

時代變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事物太複雜了，新的思想太廣博了，那種簡單的古文體，無論怎樣變化，終不能應付這個新時代的要求，終於失敗了⁽⁷⁾。

現代漢語的歐化，就正如白話取代文言一樣，根植於五四時期社會歐化的洪流之中，迎合社會的需求而產生。

第二節 新文學三部曲——介紹、模仿、創造

社會歐化，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和文字，自然也走上歐化的道路。瞿秋白提出文藝工作者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正是“實際生活的要求”⁽⁸⁾。魯迅在《康伯度答文公直》亦強調說：

我主張中國語法有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⁹⁾。

人是要“前進”的，故此，在寫作時，純用原有方

言一定不夠，那就只好“採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¹⁰⁾”。

事實上，正如胡適所說：“舊小說的白話實在太簡單了，在實際應用上，大家早已感覺有改變的必要了⁽¹¹⁾。”在一片“西化”的熱潮沖擊下，而白話又祇具雛形，五四時期絕大部分的文藝工作者，都深信只有歐化的白話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例如陳獨秀就鼓吹新文學應以莊嚴燦爛的歐洲文學作為楷模，胡適主張以西洋近代文學為創造新文學的範圍，周作人引介西洋人道主義文學作為榜樣等⁽¹²⁾，大體都是想借助西洋語文的形式和內涵來充實、改良他們當時認為是異常“質直”、“乾枯”、“貧苦”的白話文。朱光潛就曾表示歐化是擴充和精煉白話的一個方法⁽¹³⁾。傅斯年更提出：

我們不特覺得現在使用的白話異常乾枯，並且覺著他異常的貧，——就是字太少了，補救這條缺陷，須得隨時造詞，所造的詞多半是現代生活裡邊的事物；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產；因而我們造這詞的方法，不得不隨西洋語言的習慣，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也不僅詞是如此：一切的句，一切的支句，一切的節，西洋人的表示法儘多比中國人的有精神。想免得白話文的貧苦，惟有從他——惟有歐化⁽¹⁴⁾。

那麼，歐化的路向和步驟又是怎樣的呢？雖然

新文學工作者未嘗定出一個整體的、有系統的計劃來借鑒、研究以及改良，但從他們的論見中，就可找出一些脈絡。胡適主張“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¹⁵⁾”，周作人提出“創造的模擬”，“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¹⁶⁾”，都正好揭示了當時一般學者認同和跟隨的途徑——從介紹入手，取西洋寫實自然的往規，做個榜樣，然後自己著手創造⁽¹⁷⁾。“介紹”、“模仿”、“創造”就是新文學的三部曲。

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曾說：

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復活之後，我們決心做兩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一是翻譯西洋近代和現代的文學名著⁽¹⁸⁾。

當中，翻譯可說是不能缺少的利器。雷海宗指出翻譯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介紹新的思想⁽¹⁹⁾，朱光潛認為翻譯是學習外國文一個最有效的方法⁽²⁰⁾，可見得翻譯是“介紹”西洋文學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工具。而歐化，就是由“模仿”到“創造”的必然手段和歷程了。傅斯年在《怎樣做白話文》就曾提出“在變化語言的第一步，創作的第一步，做白話文的第一步，可正是取個外國榜樣⁽²¹⁾”。他說：

作文章雖然要創造，開頭卻不能不有憑藉，不得不求個倚賴的所在。……我們主張新文學，自然也得借徑於西洋的新文學。劈頭便要創造，便不要榜樣，正合了古人說的“可憐無補費精神”。只可惜我們歷史上的白話產品，太少又太壞，不夠我們做白話文的憑藉物。……這高等憑藉物是甚麼，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詞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於現在的國語、歐化的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²²⁾。

傅氏的主張顯然過度自卑，但他在文章中大力鼓吹“理想的白話文就是歐化的白話文⁽²³⁾”，甚至還列舉做歐化文章的“程序”來引導從事寫作白話文的人⁽²⁴⁾，這對於推動漢語的歐化，無疑具有直接的影響。

總括來說，新文學工作者的歐化主張和理論，在“西化”的思潮籠罩下，無疑是過份的“卑己崇人”，忽視了中國語言文字本身的優點⁽²⁵⁾，然而他們那種“配合時代和社會實際要求”的意識以及“借鑒西洋，取長補短”的精神是值得借鏡的。也正是這種精神和意識，就一直使“國語歐化運動⁽²⁶⁾”持續下去，也一直推動著漢語歐化的發展。

第三節 翻譯——歐化的利器

談到歐化，不得不談到五四以來社會非常流行的白話翻譯。在新文學運動中，最後出現的是翻譯，但歐化漢語最直接的倒也是翻譯。梁實秋就曾提出歐化文的起因是和翻譯有關係的⁽²⁷⁾。王力在《中國語法理論》更強調：

談歐化往往同時談翻譯，有時差不多把二者混爲一談。這也難怪，本來歐化的來源就是翻譯⁽²⁸⁾。

早在一八九四年馬建忠提出“善譯”⁽²⁹⁾，一八九八年嚴復主張“信、達、雅”⁽³⁰⁾，以至後來的白話翻譯家提出所謂“字譯”、“句譯”、“直譯”、“硬譯”、“死譯”、“意譯”、“神似”、“化境”等等⁽³¹⁾，對翻譯的理論、方法雖然都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張，但“想盡量表達原文的意思，必須盡量保存原文的語句組織⁽³²⁾”，不啻是衆多譯者認同的一個標準。艾思奇在《談翻譯》就主張：

翻譯的目的雖然是要對讀者作介紹，但同時也要對原著者負責任。要把原著者的意思正確地傳達出來，最好是每一句都保持著原來的語法⁽³³⁾。

翻譯所以導致歐化，主要也在於此。在翻譯的過程中——特別是直譯，譯者往往根據原文用漢語搬譯過來。用漢語表達歐西的文句組織，自然使漢語在詞匯和語法方面都起了新的變化。王力認爲譯品、準譯品和西語爲腹稿的作品，實在是歐化語法的來源⁽³⁴⁾。他在《中國語法理論》就指出原因來：

譯品最容易歐化，因爲順著的詞序比較地省力。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青年們的歐化文章都是從它們輾轉學來的⁽³⁵⁾。

事實上，自五四運動以來，通過翻譯，漢語裡就增加了許多“歐化”的句式。例如“‘你來了，’她說”、“是的，我一定會來，要是明天不下雨”，就是不按照中國語言習慣和詞序但按照原文的結構或詞序的翻譯。“當……的時候”是從英語 **When** 搬來的；“……是如此的……以至……”的句式，就是直譯英語的“……so ……that ……”。其他還有如“取消了他的約見”、“他終於打破了沉寂”、“勤奮是成功的前提條件”等一類把動詞、形容詞用作名詞的句式⁽³⁶⁾，以及許多形形式式的歐化句子，都在報章、雜誌和譯作中活躍起來了。

歐化的本源既是翻譯，那麼，對於助長翻譯發展的因素，自然不容忽視。翻譯的風氣愈盛，漢語歐化的程度和範圍也愈深愈廣。社會越有利翻譯工

作，也就越有助漢語歐化。

第一，白話翻譯雖只是近七十年間事，但淵遠的翻譯歷史和事業畢竟已替它奠定基礎。早在遠古時期，華族與他族接觸，因語言文字不同，除當時交際上用的口頭翻譯⁽³⁷⁾外，已有流傳後世的文字翻譯⁽³⁸⁾。至於翻譯外來典籍，就可見於後漢、東晉、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佛經翻譯。到了十九世紀末，清室推行“洋務運動”，鼓吹“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讓國人對外來文化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和吸收。其間一方面派遣學生出洋學習，一方面設立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等翻譯學館、機構，培養翻譯人才，推展翻譯事業⁽³⁹⁾。及後，到了五四運動前後就更有私人譯書；有名的如嚴復、林紓，闡述翻譯標準，引進西洋近世思想和文學。翻譯事業更具規模。直至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創了白話文學的新紀元，也奠立了白話翻譯的里程碑。其間譯著倍增，文體解放，範圍擴大，由小說的翻譯及於詩歌、散文、戲劇和文藝理論等。翻譯的範圍愈廣，作品和刊銷愈多，對漢語的影響也就愈大了。

第二，二十世紀翻譯事業的蓬勃，可說是一種繼承和發展，但國人習洋和求知的態度，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雷海宗說：

無論是甚麼原因，甲種文字地區認爲乙種文字地區大批的、成套的作品，其中含有甲區

的人所急於要吸取的思想、技術與經驗，在此種情形下，甲區的人必學習乙區的語言文字⁽⁴⁰⁾。

自甲午戰爭後，民心醒覺，一方面發現自己可怕的貧弱，另一方面又欲認識西方政治、經濟、文藝、哲學和科學等方面的真實面貌，藉此富國強兵，改善國民生活。沈雁冰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就指出：

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爲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的目的⁽⁴¹⁾。

這些“應該注意的目的”，也正是造成翻譯風氣大盛的重要原因。

第三，翻譯工作固然是順應著社會的發展和需要而盛行，但其中還須得力於新文學工作者的提倡和實踐。朱光潛認爲研究文學，不精通一兩種外國文是個大缺陷，而翻譯是學習外國文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故此，爲大多數人設想，就必須作大規模的、有系統的翻譯⁽⁴²⁾。周作人亦提出要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翻譯及研究外國著作⁽⁴³⁾”。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更鼓吹不可不趕緊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作爲模範⁽⁴⁴⁾；他並且舉出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方法來：

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爲國內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爲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並一一爲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⁴⁵⁾……

胡適所提的計劃雖然到終仍沒有完全實現，但翻譯工作的意義和地位，在當時文藝工作者的心目中，還是一樣的根深蒂固；而其中最要注意的，就是他們不僅藉翻譯來介紹西洋各方面的精神面貌，同時更利用它來豐富中國語文的形式和內涵。瞿秋白就提出：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現代言語⁽⁴⁶⁾。

就像魯迅所說：“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而“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⁴⁷⁾，瞿秋白亦強調：

中國言語不精密，所以要使它更加精密；
中國言語不清楚，所以要使它更加清楚；中國

言語不豐富，所以要使它更加豐富⁽⁴⁸⁾。

他認爲藉著翻譯的幫助，譯作家就可以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來⁽⁴⁹⁾。因此，在翻譯甚至寫作的時候，就應當大膽地運用新的表現方法、新的字眼和新的句法⁽⁵⁰⁾。

中國言語是否“不精密”、“不清楚”、“不豐富”，無疑有待商榷，但藉翻譯而“輸入新的表現法”，使“中國現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豐富⁽⁵¹⁾”，確是有推動漢語歐化發展的力量。

當時，傅斯年就曾主張用直譯來介紹歐化語法，以達到歐化文學的目的⁽⁵²⁾。郭沫若提出通過翻譯來學習別國語言的構成和運用，以採長補短⁽⁵³⁾。總之，“吸收外國語言中好的東西”，不啻是衆多譯者的一個任務。高植在《翻譯在語文方面的任務》裡就說過：

中國語言在好些方面不夠用，我們非借用外國東西不可。借用字眼兒容易，借用句法就難了。然而還是非借不可⁽⁵⁴⁾。

雖然是難，可還要“非借不可”。魯迅在談及中國語法不精密時就提出來了：

要醫這病，我以爲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爲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裏，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⁵⁵⁾。

可見漢語的歐化並不是偶然而然，而是經過有意識的提倡和須“吃點苦”的嘗試。魯迅的直譯，“寧信而不順”，往往有意加入許多歐化成分，就是最好的例證了。

第四節 “模仿”的成品——歐化文學

歐化的理論和主張起著開導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若沒有歐化作品的配合、呼應，漢語的歐化只是口談，相信就沒有這樣迅速的發展和廣泛的流傳。朱光潛說得好：

無論站在舊的或新的一邊，最有力的武器是作品⁽⁵⁶⁾。

這句話不僅適用於文言、白話的鬥爭，也合於“歐化”問題方面。若理論是歐化的根，那麼，作品就得算是它的枝葉花果了。

傅斯年曾在《怎樣做白話文》裡，主張“白話

文必不能避免歐化”，只有歐化的白話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⁵⁷⁾。其實，早在新文學運動之前，梁啓超就曾自述其“新文體”說：

……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⁵⁸⁾。

梁氏的“新文體”，已雜有外國語法，正是在新的生活下所產生的新文體，無怪後人評他實爲創造新文學之一人，是新文學的先鋒了⁽⁵⁹⁾。李何林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的社會背景和文學概況》一文中就曾指出：

“其（梁啓超）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這就是“新文體”的特點。這種特點不僅梁啓超一個人的文章裡面有，譚嗣同的文章裡面也有，同時代的“談時務”的和鼓吹“維新”與“革命”的文言文裡面也多少有一些。孫中山、朱執信等革命民主派的文章，也是這種風格。這是新的生活所要求的新的文章風格。……這種新的風格的特點，一直保存和存在到“五四”發生前《新青年》雜誌裡面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的文言文裡面⁽⁶⁰⁾。

及至新文學運動爆發以後，“大膽的歐化，可說是